

# 经济金融化趋向及其对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启示<sup>\*</sup>

——基于1973—2017年美国经济发展数据的分析

王守义

**【内容提要】** 基于一个拓展的马克思生产关系思想史分析框架，运用1973—2017年美国经济社会发展数据对美国经济金融化趋向的特征进行考察后发现，美国雇佣工人劳动受制于资本且被资本剥削的程度在加深，信用过度扩张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实体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宏观经济在虚拟资本脱离产业资本的循环与增值过程中逐步“脱实向虚”，而虚拟资本在世界市场层面的扩张推动形成了新的金融帝国主义，这又加速了经济金融化趋向。新时代我国实体经济发展要进一步明确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的目标与方向、协调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加快独立自主的科技创新以夯实实体经济发展基础。

**【关键词】** 经济金融化 实体经济 生产关系

**作者简介：**王守义（1983—），云南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广西社科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基地特约研究员，西南大学访问学者（云南昆明 650091）。

## 一、引言

奋力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亟须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最新发展与变化<sup>①</sup>。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新时代我国金融与实体经济紧密联系、相互支撑、不可分割，金融的发展要回归服务好实体经济的本源，而不能搞自我循环与自我膨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和金融最为发达的国家<sup>②</sup>，美国经济金融化现象依然凸显，经济金融化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层与断裂<sup>③</sup>，对其自身乃至全球经济复苏影响严重<sup>④</sup>。如何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重新考察当代美国经济金融化趋势的特征事实，归纳提炼其对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启示，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化，尤其是日益膨胀的金融全球化对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这对于降低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推动新时代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

\* 本文得到云南大学“东陆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资助，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积累的社会结构视角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发展研究”（15CJL002）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王立胜、郭冠清：《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源》，《经济学动态》2016年第5期。

② 参见〔美〕托马斯·帕利：《金融化：涵义和影响》，房广顺等译，《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8期。

③ 参见王生升：《经济金融化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层与断裂》，《红旗文稿》2017年第9期。

④ 参见程恩富、谢长安：《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本质、特征、影响及中国对策——纪念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00周年》，《社会科学辑刊》2016年第6期。

体系，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本文第二部分从马克思生产关系思想史视角对经济金融化问题的分析框架进行了拓展；第三部分对当代美国经济金融化趋势的特征事实进行统计描述；第四部分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分别从资本金融化的财富创造和掠夺效应、资本主义信用过度扩张、虚拟资本脱离产业资本的循环与增值过程以及虚拟资本在世界市场层面的扩张四个方面分析美国经济金融化现象；第五部分是主要结论及对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启示。

## 二、拓展的马克思生产关系思想史下经济金融化的分析框架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带来的以非物质劳动为代表的新劳动范式的出现，显然不是一种独特的现象，它事实上是跟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转型相配套的，是劳动过程的本质和特质方面的变化<sup>①</sup>。从本质上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为基础、以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为核心内容的，但这种私人占有制及剥削的形式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尽相同。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生产资料所有制会因为经济金融化而具有更加抽象的形式，如果对经济金融化情形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容仅作简单化的理解，而不是从当代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特殊形式出发进行研究，显然不利于深刻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内涵。

其实，即使在马克思那里，他对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理解也不仅仅停留在私人企业的层次，他在《资本论》第3卷中对股份公司曾做过较为详细的分析<sup>②</sup>。马克思认为，股份公司的出现，一方面体现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在实现方式上趋于复杂化；另一方面更表明了虚拟资本越发展就越表现为其对剩余劳动更多的单纯占有，甚至不需要通过具体的生产过程，同样可以完成对他人剩余劳动的占有，“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发点”<sup>③</sup>。同时，马克思认为，股份公司必然会再生产出一种金融贵族，而信用制度与股份公司的出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马克思把前者看成是后者的基础。对马克思来说，股份公司的出现必然造成垄断，并产生金融贵族，信用制度发展所带来的日益增加的金融要素，促进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由于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垄断资本主义尚未形成，金融资本的统治性权力还没有得到根本的体现，因此，马克思更多的是从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角度来阐释产业资本的虚拟化、社会资本的集中以及垄断现象的出现<sup>④</sup>。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他的金融资本观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鲁道夫·希法亭的《金融资本》<sup>⑤</sup>，突出强调了帝国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公司逐渐变成了加强金融寡头的一种手段，金融资本恰恰是随着资本主义实体经济生产的集中和垄断的发展而必然出现的结果，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日益体现出其鲜明的寄生性与腐朽性，这种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观点也同时超越了布罗代尔和阿瑞基等人仅仅停

①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Labor of Dionysus: A Critique of the State-For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p. 10.

②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93-497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98页。

④ 参见唐正东：《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批判性解读》，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39-43页。

⑤ 在相关论述中，希法亭表现出其对资本主义条件下金融资本的理解缺乏社会历史感，过于从经济学的货币理论来理解金融资本的倾向。

留在历史层面上对金融资本的思考<sup>①</sup>。在此基础上，列宁进一步分析了金融资本的出现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权可以在更为复杂的宏观层面得到实现，即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资本所有者与经营者可以在世界市场层面实现融合，而这种融合正是推动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原因。与此同时，金融资本条件下的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呈现出日益分离的新特点，这意味着金融资本本身就能够实现统治，而这种独立的金融统治则说明，由垄断资本主义所决定的私有制关系已经不能跟当时的实体经济生产的社会化相适应了，必然会被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取代。正如列宁所说：“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如果人为地拖延消灭这个外壳的日子，那它就必然要腐烂，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但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sup>②</sup>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步过渡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是一个物质扩张的时代，金融资本相比工业资本逐渐弱势，但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互相融合的垄断资本控制力却在增强<sup>③</sup>。这一时期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巴兰、斯威齐和马格多夫等研究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问题，他们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是生产领域的物质扩张，而不是投资领域的金融扩张，垄断资本一方面可以更加有效地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也更加有效地发展和运用科学技术，从而在原料和资源利用方面与国家展开更紧密的合作<sup>④</sup>。尽管巴兰和斯威齐在论述金融资本内容要素时，强调了阶级斗争的存在，但可能由于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内部劳资关系较为和谐的缘故，他们并未将金融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的对抗上升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未来的发展之中去理解，尤其是主张用经济剩余规律代替马克思一般利润率规律，更说明了他们的研究过于注重经济技术层面而忽略了社会历史基础。

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现象的分析起源于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sup>⑤</sup>，经济金融化更多地被激进政治经济学学者用来描述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积累体制金融化的趋势<sup>⑥</sup>，其内涵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去工业化趋势被赋予了更广泛的含义。1973年滞胀危机后的当代资本主义进入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全球化和90年代的金融化条件下，新自由主义并未改变或消除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国家权力通过保护与推动金融组织的发展来促进资本积累的增长，金融领域的投机行为所带来的不公平分配，导致了债务与投机行为盛行及环境恶化。同时，去工业化带来了工业资本主义的衰退，制造业工人大量失业，消费部门与生产部门的脱节导致消费危机显现，这都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危机，使不断重复的金融危机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sup>⑦</sup>。2008年金融危机后，构筑在空间化基础上的经济全球化程度并没有减弱，反而日益深化，在跨国公司的推动下，经济金融化带来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间日益脱离的发展态势，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形式的多样性也使得资本增值的最终受益主体复杂化，但没有改变的是贫富分化日益加剧、雇佣工人边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金融化等一系列

① 参见唐正东：《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批判性解读》，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47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87页。

③ 参见〔美〕保罗·斯威齐、哈里·马格多夫：《美国资本主义的动向》，郑瑄、张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165-169页。

④ 参见〔美〕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11、14、22、29-30页。

⑤ 参见孙平：《金融价值论视域下的中国经济金融化研究》，《经济问题探索》2017年第3期。

⑥ P. M. Sweezy, "Modern Capitalism and Other Essay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9, No. 3, 1972.

⑦ R. Peet, "Contradictions of Finance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Vol. 63, No. 7, 2011.

内在危机，不过这在根本上仍然是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所决定的。

但同时，我们仍应该理性地看到，不管是从经验层面还是从社会历史过程中去研究经济金融化现象，一定时期内适度的经济金融化确实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该时期实体资本增值与社会物质财富创造的时空范围，对实体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缓和了该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劳资矛盾，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稳定发展，但是过度金融化无疑对实体经济起到的负面影响要远远大于正面影响。因此，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没有改变和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形式在金融化条件下已经改变的事实出发，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金融化及其对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启示进行研究，最根本的还是应该着眼于“金融应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这一逻辑主线，对经济金融化趋向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容进行宏观及微观层面的批判式分析，借鉴经验、吸取教训，努力将我国经济金融化程度控制在合理、有效、积极的范围内，发挥其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

### 三、当代美国经济金融化趋势的特征

本部分基于 1973—2017 年美国经济社会发展数据，选取制造业和金融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金融资产在国家及非金融企业总资产中的比重、非金融企业直接融资金额占企业总融资额的比重、美国上市公司总市值占当年 GDP 比重、美国个人在金融服务和保险上的消费支出占个人总支出比重等指标<sup>①</sup>，对当代美国经济存在金融化的特征进行统计描述。

#### 1. 制造行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下降而金融行业占比平缓上升

金融行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可以反映金融行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该比重越大，说明经济金融化程度越高。如图 1 所示，从 1973 年以来的总体趋势看，美国金融行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是逐年上升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制造业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美国实体经济的行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一直呈现下降趋势，并在 80 年代中期被美国金融行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越，尤其是当 2007 年美国次级信用债务危机从房地产市场蔓延到信贷市场后，这种趋势更为明显。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尽管美国金融行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在 2008 年呈现出下降趋势，但到 2009 年该比重已经恢复到 2007 年的水平，2010 年至 2013 年期间该比重维持在 19.50%—20.00% 之间波动，并从 2013 年开始又呈现出缓慢上升趋势，经济金融化趋向非常明显。裴祥宇从微观部门测度了美国经济金融化水平，发现美国经济金融化呈现不断加强的趋势，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则具有周期性上升的特征，他进一步指出，虽然联邦基金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非金融部门企业的金融化，但无法阻挡其金融化逐步加深的步伐<sup>②</sup>。

#### 2. 金融资产在国家及非金融企业总资产中的比重均呈现缓慢上升趋势

金融资产在总资产中占的比重反映了一国金融发展的总体情况，该比重越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经济金融化程度越高。从图 2 可以看出，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美国金融资产在国家总资产中的比重超过非金融资产，开始快速上升，同时在宏观经济金融化趋势逐步显现的情况下，微观层

<sup>①</sup> 根据美国统计资料，美国的金融行业主要包括金融、保险、房地产和租赁业（FIRE）。就现有文献来看，学者们对选取哪些指标来表征一国是否存在经济金融化是有争议的，尤其是部分学者选取了很多指标并进行复杂化的数据处理，却忽略了对金融化现象背后的本质进行深层次的分析与把握，所以本部分没有使用复杂的指标和数据处理，仅选取五大类普遍使用的指标，但也说明了后金融危机时期美国经济金融化现象是客观存在的。

<sup>②</sup> 裴祥宇：《美国经济金融化测度研究》，《商业研究》2017 年第 1 期。

面的非金融企业总资产中金融资产占比也一直在缓慢上升,即在1973年之后的实体企业资产构成中,金融资产比重逐步超过非金融资产,呈现出缓慢上升趋势。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看,美国经济金融化趋向均很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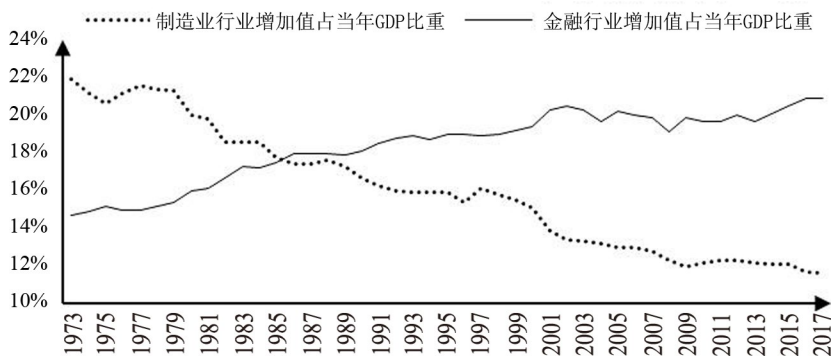


图1 1973-2017年美国制造业和金融业行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变化趋势

注:数据由美国国家经济分析局网站 (<http://www.bea.gov>) 和 WIND 数据库提供的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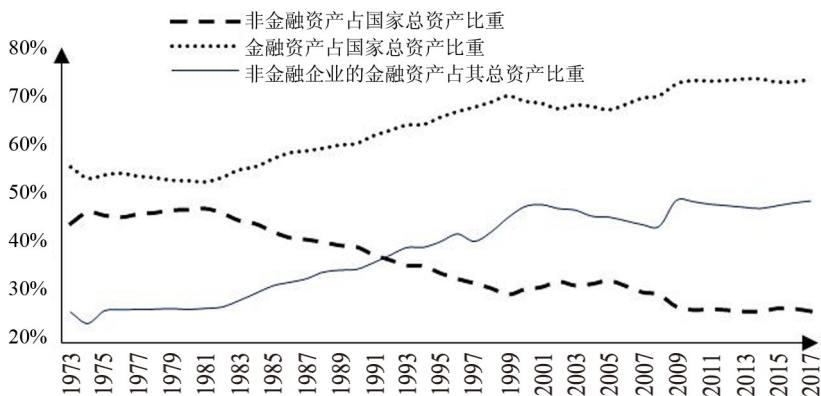


图2 1973-2017年美国金融资产在国家及非金融企业总资产中的比重变化趋势

注:数据由美国国家经济分析局网站 (<http://www.bea.gov>) 和 WIND 数据库提供的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到

### 3. 非金融企业直接融资额占企业总融资额的比重维持在高位运行

企业通过直接融资渠道获得的融资额占总融资的比重直接或间接反映了一国金融市场的成熟度及经济金融化的程度,该比重大说明了金融市场更为成熟,也间接表明该国金融化程度较高。从图3可以看出,自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非金融企业从金融市场中获得直接融资的比重就一直维持在50%以上,2017年达到79.5%,与此同时,这些企业从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贷款等间接融资比重却持续走低。这一方面印证了美国确实是一个金融市场极为成熟与发达的经济体,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美国实体企业及经济发展中的金融化程度较高。

### 4. 美国上市公司总市值占当年GDP比重在波动中呈现上涨的趋势

上市公司总市值占GDP比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经济金融化程度,由于上市公司市值是用股价与总股数乘积来计算,其计算前提是把你公司作为一个存续体,围绕着公司未来现金流来展开

的，并非以公司的净资产来计算，所以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总是想方设法地抬高股价，制造泡沫。如图4所示，受金融危机影响，美国上市公司总市值占GDP比重在2007年大幅下降，但美联储和财政部积极推出的稳定金融市场的救市计划受到了股市投资者的“积极回应”，2008年开始美国股市逐步回暖，上市公司总市值占GDP比重在上下波动中呈现上涨的趋势。可以看出，美国经济金融化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其带来的后果表现在股市上，即股价脱离公司实际价值，引发金融市场动荡，增加金融危机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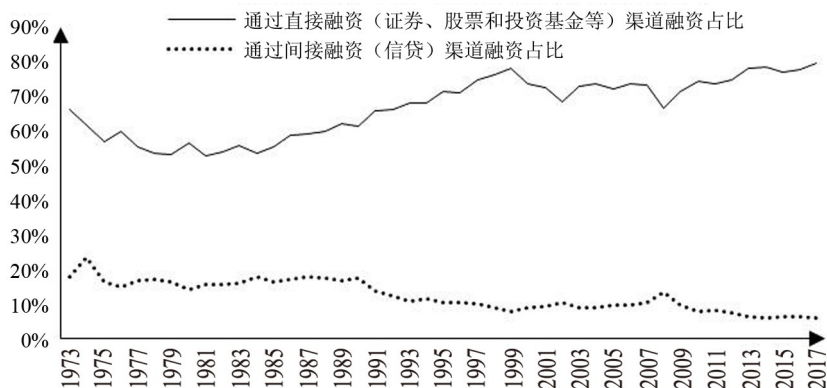


图3 1973—2017年美国非金融企业从金融市场融资占总融资比重变化趋势

注：数据根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WIND数据库提供的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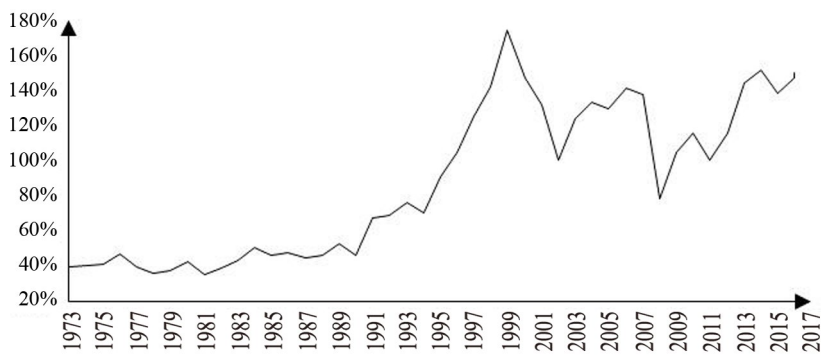


图4 1973—2017年美国上市公司年度总市值占当年GDP比重变化趋势

注：数据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 and WIND 数据库提供的相关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 5. 美国居民在金融服务和保险上的消费支出占家庭总支出比重稳定在一定的水平

居民在金融服务和保险上的消费支出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国经济金融化的程度，该支出与经济金融化水平基本上呈正比例关系。图5是美国居民在金融服务和保险上的消费支出，1973—2017年美国居民在金融服务和保险上的消费支出维持在较高水平，且基本保持稳定。

在过去几十年期间，受益于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双增长以及消费金融领域的不断创新，消费金融一直是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sup>①</sup>，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尽管美国市场利率水平降至历史低位，

① 孙章伟：《美国消费金融及其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分析》，《国际金融研究》2010年第5期。

居民在金融服务保险方面的支出也在2012—2014年出现了短暂的下降，但是在市场利率上扬的2015年出现了上升。从整体来看，美国金融服务和居民消费支出对市场利率的反应并不敏感，较高的整体经济金融化水平所催生的消费金融模式，使得美国经济波动对居民金融服务和保险支出的影响较小，而较高的金融服务和保险支出又反过来加剧了经济金融化程度，对美国实体经济的持续复苏与稳定发展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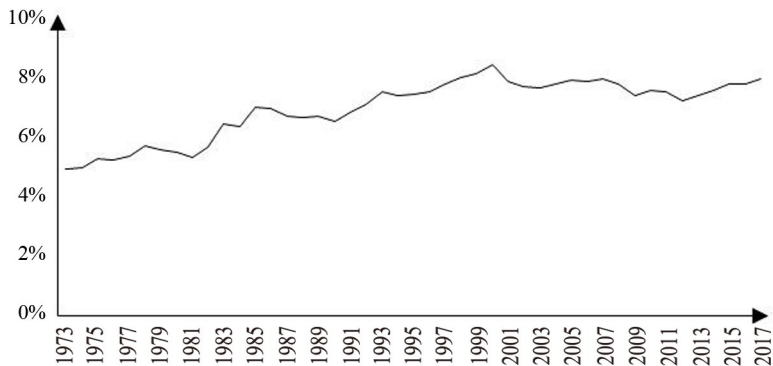


图5 1973—2017年美国居民金融服务和保险的支出占家庭总消费支出比重变化趋势

注：数据根据美国国家经济分析局网站 (<http://www.bea.gov>) 和 WIND 数据库提供的相关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 四、当代美国经济金融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综上所述，当代美国经济发展中的金融化现象是客观存在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济金融化使得当前美国“金融”与“实体经济”间发展的界限已经十分模糊，而且在金融发展的自身逻辑中，客观上就潜藏着对实体经济不断“疏远化”的倾向，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尤甚<sup>①</sup>。此时回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原理与方法，重新认识与分析当代美国经济金融化趋向就显得极为必要。

##### 1. 资金融化的财富创造和掠夺效应加剧了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不平等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基本矛盾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关系则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列宁进一步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是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sup>②</sup> 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了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矛盾已然无法调和，在历次危机爆发前，生产关系已经潜藏着劳资关系不平等的“萌芽”，而在金融化发展的过程中，金融化资本所具有的“财富创造效应”和“财富掠夺效应”特点更是加剧了这种不平等。

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中一种重要的资源配置工具，起步阶段的金融化确实能够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帮助企业更容易地获取融资以进行扩大再生产，加之此时的金融资本与雇佣劳动间的关系较为

<sup>①</sup> 参见李扬：《“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辨》，《经济研究》2017年第6期。

<sup>②</sup> 《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9页。

和谐，因而可以促进企业快速发展和生产力水平提升，这就是适度金融化的“财富创造效应”，此时的金融化可以快速推动社会财富的创造和价值积累。当金融化超过了一定程度进入过度金融化状态之后，经济金融化则会对整个社会造成消极影响——投机、拜金、享乐主义盛行，实体产业空心化、食利阶级范围扩大化现象会不断出现，金融资本扩张导致金融资本主导雇佣劳动，资本逻辑盛行将威胁到实体经济发展，“财富掠夺效应”开始显现，即过度的金融化使社会资本大量流向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领域，以获得比实体经济更高的利润，由此加剧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背离，导致实体经济利润进一步萎缩。

与此同时，金融市场中买者与卖者就股票、债券、保险和房地产的买卖行为本身并不会创造价值，对于财富创造而言，它只不过是买者与卖者间的零和博弈，经济金融化看似促进了生产扩张，实则通过通货膨胀掩盖了金融资本家通过金融工具转移其他阶层财富，及其对低收入阶层进行剥削和压榨的经济事实<sup>①</sup>。经济金融化情形下，企业管理层会改变投资的先后顺序，优先考虑将资本投入金融及相关行业以获取高额利润，然后才考虑投资到实体中去<sup>②</sup>，由此带来了实体经济中资本与投资短缺，制造业等实体经济衰退，制造业吸纳就业人口占劳动力人口比重随之下降，如图6所示，但同期繁荣发展的美国金融行业所吸纳的就业人数占比却未出现明显增长。这是因为，金融业高收入的特点决定了其不大可能吸收大量劳动力，而受到影响的制造业就业人口减少，又进一步加剧了金融业与制造业之间劳动力与劳动力、劳动力与资本间关系的紧张，实体经济的潜在危机开始凸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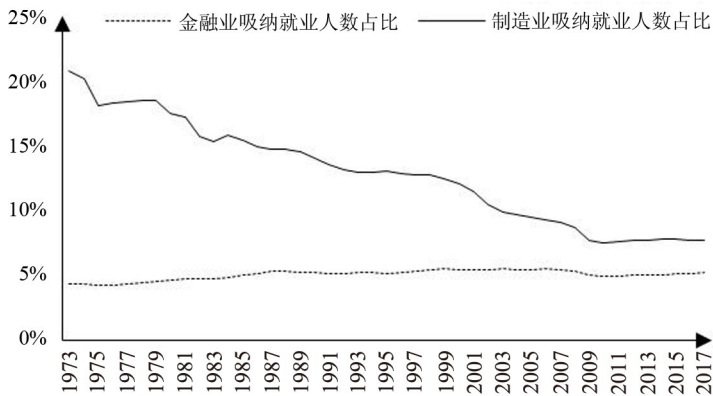


图6 1973-2017年美国金融业和制造业吸纳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变化趋势

注：数据根据 WIND 数据库提供的相关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 2. 资本主义信用过度扩张加剧生产关系的不稳定性及实体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

马克思认为，纯粹的商品货币体系将成为资本积累持续进行的障碍，因为资本积累本身会受到价值形式的限制，而借助于信用，资本可以没有限制地进行积累。马克思也曾对从属于产业资本的信用给予肯定，他指出，信用制度是作为对高利贷的反作用而发展起来的<sup>③</sup>，现代银行制度一方面

① P. M. Sweezy, “The Triumph of Financial Capital”, *Monthly Review*, Vol. 46, No. 2, 1994.

② Özgür Orhangazi, “Financialisation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the Non-financial Corporate Sector: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n the US Economy: 1973-2003”,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32, No. 6, 2008.

③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78页。



把闲置的货币准备金集中起来，并把它投入到货币市场，从而剥夺了高利贷资本的垄断；另一方面又建立信用货币，从而限制了贵金属本身的垄断<sup>①</sup>。在理想化的设想中，产业资本甚至能够通过信用体系摆脱对前资本主义金融货币所有者阶级的依赖，从而建立起纯粹的产业资本主义秩序，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市场促进了19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运输业、20世纪的现代股份制企业以及21世纪的金融市场活跃发展，信用突破贵金属货币的数量限制，使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突破了时空限制，极大地加快了资本周转，金融化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产业资本在经济社会运动中的阻力，提高了社会生产效率，促使利润平均化，进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竞争。

但同时，金融化推动下的信用往往不顾实体经济而自我膨胀，推动了资本集中，造成了生产过剩和投机过度<sup>②</sup>，无限制的积累使得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是呈倒U型的曲线，经济金融化反而会抑制经济增长<sup>③</sup>，导致金融震荡和危机频发。金融危机爆发则会加速银行信用破产，信用大幅收缩及利息率的提高会使实体企业利润率急剧下降，这些都会减少资本家对实体经济的投资，资本从实体经济中大量流出，导致实体经济破产的暗流一触即发，加之信用和资本之间将会呈现一个螺旋式下降的关系，最后导致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的金融震荡和危机频发。马克思强调，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危机的发生与信用的萎缩必然在资本主义产业周期中出现，信用制度危机加剧，而货币——贵金属形式的货币——仍然是基础，信用制度按其本性是永远不能脱离这个基础<sup>④</sup>。这里所说的信用制度的本性，就是指资本主义信用制度是以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基础的<sup>⑤</sup>，而资本主义信用过度扩张带来的经济金融化将会加剧实体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对于实体经济中的中小企业而言，受制于自身能力，它们往往会无法准确识别或者忽视市场中已经客观存在的商品过剩，仍旧在盲目扩大生产，这无疑将增加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从而给实体经济运行带来诸多的不确定性。

### 3. 虚拟资本脱离产业资本的循环与增值过程致使一国国内经济逐步“脱实向虚”

在《资本论》第1卷和第2卷中，马克思严格假设了资本家自身就是货币所有者，即抽象掉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普遍存在的借贷行为，但事实上，许多资本家除了使用自有资本之外，还或多或少地使用借入资本。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指出，随着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一切资本都会增加一倍，有时甚至两倍，同一些货币不知同时充当多少次存款的工具<sup>⑥</sup>。这种由被现代金融学称为“存款创造货币”而带来的信用货币构成了马克思虚拟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虽然这种以生息为主要目标的虚拟资本运动仍然是以资本的现实运动为基础，但在形式上不再表现为由生产过程决定，而是有很强的任意性。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虚拟资本是在职能资本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并为职能资本服务，但虚拟资本的循环从形式上独立于现实资本循环之外了，与产业资本积累相比，虚拟资本积累日益显示出了其在资本循环与增值方面的“独特优势”。

马克思的这种观点可以理解为，产业资本将使金融资本从属于自己的需要，不管是产业资本还是生息资本，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资本增值。产业资本增值是通过投入资本购买生产资料，然后提高商品的价格销售出去实现的，这个过程归纳为公式G—W—G'；而生息资本则是以一种更为简便

①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82页。

② 参见程恩富、谢长安：《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本质、特征、影响及中国对策——纪念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00周年》，《社会科学辑刊》2016年第6期。

③ S. G. Cecchetti and E. Kharroubi, “Reassessing the Impact of Finance on Growth”, *Bis Working Papers*, No. 381, 2012.

④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85页。

⑤ 参见张宇等：《中级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8页。

⑥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33、535页。

的方式实现增值，它中间没有任何实物但却瓜分产业利润，公式是  $G-G'$ ；对资本家而言，二者的目的都是为了使资本增值，即公式  $G'=G+\Delta G$ 。但上述过程对于一国来说，其结果就不一样了。产业资本是为卖而买，流通的是实实在在的商品，货币只是作为一般等价物；而生息资本仅仅是以货币换取更多的货币，出让的是货币的使用权，并没有任何实际的商品生产与流通。社会经济发展不能依靠这种单纯的钱生钱所带来的泡沫来维持，否则扩大再生产终将因泡沫的破灭而无法进行，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迅猛发展，经济金融化程度较高的国家都企图不再通过复杂的生产环节就得到财富，其中金融危机爆发前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冰岛就是一个典型。2008年金融危机前，冰岛政府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解除了外资对本国银行持股比例的限制，瑞典考普森银行也借此在2003年完成了对冰岛农业银行的并购，其中考普森银行占51.77%的股份，农业银行股东占48.23%的股份<sup>①</sup>，为了在短期内谋取大量利差，冰岛的银行家们走出国门，开始在国际借贷市场大肆借贷、发债、扩张，银行财务杠杆大幅度提升，2008年冰岛金融机构的外债规模已经超过了GDP的8倍<sup>②</sup>，金融服务业已经取代传统渔业成为冰岛的主导产业。危机爆发后，冰岛三家银行破产，农业银行（考普森银行）就是其中之一，此时这家银行的总债务高达1660亿美元，负债率比冰岛全年GDP还高出3倍，冰岛OMX Iceland 15指数<sup>③</sup>也受到影响，其中一些指数成分股企业濒临破产，被迫国有化或选择退市，该指数最终因2009年7月股市崩盘而中止。

#### 4. 虚拟资本在世界市场层面的扩张推动形成了新的金融帝国主义

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的根源在于资本的本性，是资本自身扩张运动的最终产物，是生产和交换的经济条件，在我们的时代，它们结合于世界市场这一概念之中<sup>④</sup>。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这种伴随着资本全球化的世界市场的出现，正是为了缓解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下降而导致的相对过剩危机，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剥夺范围也随着世界市场扩展了<sup>⑤</sup>。随着虚拟资本的世界运动，产品总量急剧增加，世界市场变得愈加狭窄，可供榨取剩余价值的市场日益减少，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在普遍的世界市场危机中集中地暴露出来<sup>⑥</sup>。20世纪80年代，资本全球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美国利用其美元霸权地位从世界各地购买商品，对国外进行投资，在世界范围内扩张金融垄断资本，逐渐形成了新的金融帝国主义，美国自身不仅出现了“经济金融化”的现象，整个世界经济结构也因新的金融帝国主义而失衡。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世界上约有跨国公司10万家，其分支机构约有86万家，遍布全球，其生产总值已占工业国家总产值的40%，控制世界贸易额的50%<sup>⑦</sup>。

与此同时，新的金融帝国主义掌握巨额金融资本，随时可能渗透并控制一国国民经济，危害一国金融主权和安全。如2001年阿根廷政府开始加大资本市场开放步伐，迅速实现了投资和贸易的自由化，其国内最大的10家银行中有8家开始被外国资本控股，随后外国资本逐步控制了阿根廷整个银行体系，国家金融主权逐步丧失，最后，金融危机的爆发就彻底引发了阿根廷国内严重的财政、

① 吴婷婷、唐丽霞：《冰岛金融自由化历程：危机、教训与启示》，《武汉金融》2017年第6期。

② 冯登艳：《虚拟经济必须依托本国实体经济：冰岛危机的启示》，《商业研究》2010年第6期。

③ OMX Iceland 15（原ICEX15）指数由15家在冰岛证券交易所上市市值最高的公司组成的市场价值加权指数，其中三大银行（格里特利尔银行，考普森银行和冰岛国民银行）的股票市值所占权重占OMX Iceland 15总权重的73.2%。

④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88页。

⑤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06页。

⑥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10页。

⑦ 胡乐明、张建刚：《论后危机时代的资本主义新常态》，《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年第12期。

社会和政治危机。与此相反的是，美国虽然一直在积极地主张并推销其金融自由化理念与政策，但其国内最大的9家银行始终没有对外国资本开放。鉴于此，如何防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帝国主义的渗透，已经成为新时代维护我国金融安全的重要工作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今后要“有序开放”银行卡清算等市场，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限制，放宽或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统一中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标准<sup>①</sup>。其中，“有序开放”既是践行十九大精神的必然要求，同时又提醒我们必须依据国内实体经济发展阶段与实际，在独立自主的原则下，谨慎并逐步开放金融市场。

## 五、主要结论及对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启示

上述研究表明，在当代美国经济发展的金融化趋向和进程中，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决定的雇佣工人劳动受制于资本且被资本剥削的事实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潜在危机，而资本主义信用过度扩张加剧了生产关系的不稳定性及实体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最终使得虚拟资本脱离产业资本自行循环与增值，导致美国国内经济逐步“脱实向虚”。当我们将经济金融化扩展到国际视野再考察，不难发现虚拟资本在世界市场层面的扩张推动形成了新的金融帝国主义，这反过来又加剧了美国国内经济金融化的程度。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以及当代美国经济金融化的历史事实都在警示我们，一国金融业的发展务必要回归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本质上来。推动新时代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当前亟须做好以下工作。

### 1. 进一步明确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的目标与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sup>②</sup> 金融作为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其改革不仅关系国家经济安全，还与社会生产与发展息息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金融改革要服务于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的整体转型升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作贡献。对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来说，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建立健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和风险预警监测体系，坚决抵制金融帝国主义对我国本土银行进行金融渗透等工作就显得十分必要而紧迫。一方面，我国的银行、证券、保险业起步较晚，对金融自由化的风险和危害认识不深，过早过度开放可能导致金融波动；另一方面，银行证券行业联系范围广泛，涉及企业及民众利益，从属于战略性金融行业，向来是国际资本争夺的重点，将银行证券业对外资进行一定程度的开放，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股市繁荣。因此，在当前金融行业的改革与发展中，必须始终坚持并明确“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向与目标，同时政府应进一步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引导金融创新向着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这一方向展开，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去杠杆”和“降成本”目标尽快实现<sup>③</sup>。

### 2. 协调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我国要构建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这迫切需要协调实体

① 参见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2018年3月23日。

② 《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 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17年7月16日。

③ 参见王守义、陆振豪：《以虚拟经济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研究》，《经济学家》2017年第8期。

经济和虚拟经济发展，也亟须政府在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扮演引导者角色。新时代的金融体制改革要兼顾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只有将金融与实体经济合理对接，我们国家的经济才能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上走得更稳、更长。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根基，根基不牢则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目前我国也广泛存在着实体经济盈利能力下降所带来的社会资本大量流向金融和房地产的现象。基于对美国经济金融化发展特征事实的考察，我们既要积极发展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金融业，又要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这样既能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提高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又能降低过度金融化给实体经济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一方面要调整经济结构，持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实体企业产能过剩、库存积压、供需错配、成本过高等问题；另一方面要引导金融市场的发展，鼓励有助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创新，坚持合理适度的创新，避免金融改革步子迈得太大导致监管制度与金融自由化程度间出现不匹配。

### 3. 加快独立自主的科技创新以夯实实体经济发展基础

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认为，脱离产业资本发展，单纯依靠虚拟经济部门的创新与发展看似拉动了经济增长、促进了财富积累，但整个过程不可持续。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实际是由于货币超发导致的“货币幻觉”，金融化增加了发达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导致金融危机频发，这给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教训，我们的经济发展要注重实体经济发展。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大力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从制造业小国向制造业大国转变，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与发达国家间的技术差距，但我们掌握的核心技术和原创技术依然较少，这次中兴事件再次暴露这一缺陷。立足于新时代，只有科学规划，持续增加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我们才能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将实体经济的国民经济“基石”作用真正发挥出来。一是坚持以创新发展为核心，以提高科研支出绩效为目的，加快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和完善多层次多类型人才培养体系，实现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历史跨越；二是坚持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施高端装备、信息网络、集成电路、新能源、航空发动机等重大项目发展战略，培育一批新兴主导产业；三是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争占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的战略创新高地。

#### 参考文献：

- [1] 卫兴华：《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问题的研究与争鸣评析》，《经济纵横》2010年第1期。
- [2] 白钦先：《经济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的挑战与启示》，《世界经济》1999年第6期。
- [3] 程启智：《论马克思生产关系二维理论：所有制和依赖理论》，《当代经济研究》2009年第6期。
- [4] [法] 弗朗索瓦·沙奈等：《金融全球化》，齐建华、胡振良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 [5] 李义平、刁文：《中国经济金融化再思考》，《河北学刊》2016年第3期。
- [6] 鲁品越：《生产关系理论的当代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 [7] 邢文增：《经济金融化必将加剧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动荡》，《红旗文稿》2015年第20期。
- [8] 张成思、张步县：《再论金融与实体经济：经济金融化视角》，《经济学动态》2015年第6期。

(编辑：黄华德)